



俄国文学史

德·斯·米尔斯基 著
刘文飞 译

上卷



人民出版社

I512.09
20132
1

俄国文学史

上卷

德·斯·米尔斯基 著
刘文飞 译



人民出版社

献给简·艾伦·哈里森

米爾斯基和他的《俄國文學史》

劉文飛

1999 年在牛津大學訪學時，我見該校俄國文學專業學生所採用的教科書正是這部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與牛津同行談起其作者，對方均贊不絕口，牛津的俄國文學教授杰拉爾德·史密斯（G. S. Smith）更是向我詳細介紹了米爾斯基的生活和創作，並贈我一本由他新編的《米爾斯基致蘇福欽斯基書信選（1922—1931）》（*The Letters of D. S. Mirsky to P. P. Suvchinskii, 1922—1931*）^①。2009 年我以富布賴特學者身份在耶魯大學斯拉夫系訪學一年，發現該系師生依然以所謂“米爾斯基文學史”（Mirsky's history）為教學藍本，這更讓我意識到這部英文版俄國文學史的影響和價值。不過，我最終下定決心翻譯這部著作，還是在我先後讀到兩段文字之後。

第一段話出自納博科夫之口。在 2010 年莫斯科國際書展上，我購得米爾斯基文學史的俄譯本^②，在該書封底上我看到這樣的簡介：“這部由一位俄國文學家寫就的舉世聞名的俄國文學史著，在其英文版面世三分之一個世紀後被首次提供給俄語讀者。其作者的名字，即‘紅色公爵’德·彼·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多年來僅為

① Birmingham Slavonic Monographs No. 26, 1995.

② Д.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пер. с англ. Р. Зерновой, Изд-во Свиньин и сыновь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9.

少数专家所知。这部著作作用朴实明朗的语言写成，一贯吝啬褒奖的弗·纳博科夫并非平白无故地认为，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лучш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любом языке, включая русский），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经一番搜寻，我终于找到此话的最初出处：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希望重印米尔斯基文学史的美国编辑致信纳博科夫，希望后者写一份建议再版此书的推荐信，纳博科夫并未同意，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是的，我十分欣赏米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我认为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不幸的是，我必须放弃举荐此书的荣幸，因为这位可怜的学者如今身在俄国，由我这样一位反苏作者所写的推荐意见定会给他造成相当大的麻烦。^①

第二段话来自曾在牛津向我谈起米尔斯基的史密斯教授，我正是在他的专著《米尔斯基：俄英生活（1890—1939）》（*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中找到了纳博科夫那句话的出处。在该书引言中，我又读到史密斯的如下一段话：

俄国境外所有的俄国文学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均熟知米尔斯基，因为他那部从源头写至1925年的文学史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部俄国文学史。这部杰作起初以两卷本面世，后以单卷缩略本再版。这部著作始终在英语世界保持其地位，逾70年不

① Vladimir Nabokov, *Selected Letters, 1940—1977*, ed. Dmitri Nabokov and Matthew J. Bruccoli, London, 1990, p. 91. 转引自 G. S.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5. 纳博科夫并不知道，在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米尔斯基已死于苏联远东地区的集中营。

变，这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记录。^①

纳博科夫所言之“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the best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any language including Russian)，以及史密斯所称的“或许创下了同类著作的一项记录”(may well be a record for this kind of book)，便构成了我翻译此书的动机和理由。

二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Dmitry Petrovich Svzatopolk-Mirsky)^②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俄国政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时用俄英两种语言著书撰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极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其充满突转的生活经历和坚忍不拔的文学活动构成当时文坛的一段传奇，甚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一个缩影和一种象征。

米尔斯基出身显赫，其先祖据说可追溯至公元9世纪应斯拉夫人之邀入主罗斯的留里克王，他的父亲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857—1914)是沙皇麾下高官，曾任骑兵上将、侍从将官和省长，最后官至内务部长，著名的1905年革命就爆发于他父亲的任期，据后人判断，“流血的星期日”之发生与这位内政部长的疏忽、优柔甚至“善良”不无关系。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于1890年9月9日(旧历8月22日)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省

^① G. S.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 p. xi.

^②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是复姓，本书作者流亡西方后，或许为了简便易记，在发表英文文章时仅署名“米尔斯基”，在他后来返回苏联后发表俄文文章时，亦大多只用“米尔斯基”之单姓形式。

的贵族庄园吉约夫卡（Гиёвка；Giyovka），童年和少年时期，他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通过家庭教师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等欧洲主要语言，并多次游历欧洲，至少三次到过英国。

少年米尔斯基曾在莫斯科的贵族中学短暂求学，后转至彼得堡第一古典中学。正是在这所中学，他与后来均成为著名作家或学者的几位同学日尔蒙斯基、普姆比扬斯基和苏霍金一同创办文学刊物《环节》（Звенья），这份刊物分别在1906年和1907年出版两期，米尔斯基在刊物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济慈、魏尔兰等人的诗以及他自己的诗作，“这是米尔斯基作为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的首次文学亮相”^①。与此同时，米尔斯基接近当时统领文坛的象征派，与勃洛克、库兹明、古米廖夫等人均有往来，曾参与伊万诺夫的“象牙塔”沙龙的活动。1908年，米尔斯基考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汉语和日语。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抱怨汉语难学：“日语相当简单，可汉语却十分奇特，其语法迥异于任何概念。”^②1911年，米尔斯基应征入伍，驻扎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就在次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1906—1910年诗选》（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1906—1910）。1913年，米尔斯基退伍返回大学，进入古典系学习。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米尔斯基再度应征入伍。1906年，他负伤住院，住院期间与一位名叫维拉·弗列里诺娃（Вера Флеринова）的女护士闪电成婚，两人一起生活数周后便决定分手，米尔斯基后对此事闭口不谈，甚至“忘记向母亲提起这场婚姻”，此后，米尔斯基终身未娶。这段短暂的“战地爱情”或可视为米尔斯基既浪漫冲动又神秘莫测的性格特征之典型体现。

1917年革命爆发后，米尔斯基加入邓尼金的白卫军部队与布尔什维克作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残酷的战斗之余并未放弃学

① G. S.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 p. 37.

② В. В. Перкин, “Одиннадцать писем (1920—1937) и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1936) Д. П.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ог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6 № 1, с. 259.

术，竟于1918年秋在哈尔科夫大学获得史学学位。1920年，米尔斯基如同许多战败的俄国贵族一样流亡国外，先波兰后希腊，最终落脚英国伦敦，其间经常往返伦敦和巴黎之间，探望他侨居法国的家人和朋友。自1920年10月起，当时身在雅典的米尔斯基便开始给《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投稿，先后开设“俄国来信”（*Russian Letters*）和“国外新书”（*Recent Foreign Books*）等栏目，为该刊撰稿长达十余年。在米尔斯基步入英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过程中，有三位英国人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位是著名的英国斯拉夫学者莫瑞斯·巴林（*Maurice Baring*, 1874—1945）。巴林早年在俄国从事外交和新闻工作，日俄战争期间曾在中国东北地区任战地记者，他后与米尔斯基一家成为朋友，曾造访米尔斯基家的庄园吉约夫卡，在米尔斯基一家流亡后，他伸出援手，正是他将米尔斯基推荐给了包括《伦敦信使》在内的多家英文报刊。在米尔斯基移居伦敦之后，他又将米尔斯基介绍给伦敦的多家学会和俱乐部，米尔斯基后将这部《俄国文学史》率先出版的下卷题词献给巴林。第二位是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 1867—1949），佩尔斯是英国斯拉夫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曾任英国驻俄外交官，著有《俄国与改革》（*Russia and Reform*, 1907）和《俄国史》（*History of Russia*, 1926）等书，他于1907年在利物浦大学创办俄语学院，后将该学院移至伦敦，更名为斯拉夫研究院（*School of Slavic Studies*），该院实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系，这里实际上是整个英国的俄国问题研究中心。1922年春，佩尔斯邀请米尔斯基担任该院俄语讲师和该院刊物《斯拉夫评论》（*Slavonic Review*）的编辑，米尔斯基在这里辛勤工作十余年，“老板”佩尔斯为米尔斯基提供了在西方研究和传播俄国文学的机遇和条件，但两人后由于政见不同和性格差异而渐行渐远，米尔斯基最终选择返回苏联与佩尔斯后来的冷淡似不无关系。第三位是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 1850—1928），哈里森女士是剑桥大学古代考古学教授，1926年移居巴黎后继续其学术研究，

是当时欧洲著名的古代宗教专家和古人类学家，她通过米尔斯基以及当时侨居巴黎的俄国作家列米佐夫等了解到俄国古代文化，曾翻译阿瓦库姆的《生活纪》，反过来，她也对米尔斯基的英文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米尔斯基将这部《俄国文学史》的上卷题词献给哈里森，他还在下卷的序言中向哈里森致谢，称“她以无尽的善意和耐心阅读此书的许多章节，并对我糟糕的英语作出许多无价的订正”。就这样，这三位英国文人学者分别从新闻和出版、学术和教职、文化和文字等三个方面向米尔斯基提供帮助，使他迅速融入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知识界。

米尔斯基旺盛的工作激情和写作能量十分惊人，他仅活到49岁，这短暂的一生还充满求学和教学、革命和战争、流亡和囚禁、旅行和奔波，可他却笔耕不辍。据史密斯教授统计，自1920年底至1937年，米尔斯基发表各类文章或著作共400种，“平均每两周一种，这一惊人频率竟持续16年之久”^①。除大量文章和讲稿以及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相关词条外，米尔斯基先后用英文撰写或编纂了九部著作，即《俄国抒情诗选》（*The Russian Liryc*, 1924）、《现代俄国文学》（*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1925）、《普希金》（*Pushkin*, 1926）、《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1881—1925>*, 1926）、《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Dostoyevsky <1881>*, 1927）、《俄国史》（*A History of Russia*, 1928）、《俄国社会史》（*Russia: A Social History*, 1931）、《列宁传》（*Lenin*, 1931）和《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 1933）。随着这些著作的相继面世，米尔斯基迅速成为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欧学界最负盛名的俄国问题和俄国文学专家。他在授课之余为西欧诸国的报刊撰稿，在英、法、德各地做关于俄国文学和文化

^① G. S.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 p. 81.

的演讲，还曾于1928年游学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学术报告。

身在西欧的米尔斯基，其关注点并不仅仅在于俄国文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政论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表现，即他在欧亚主义运动（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中的表现和影响。自1922年起，他便开始接近该运动及其四位创建者，即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彼得·萨维茨基和彼得·苏福钦斯基。欧亚主义运动以上述四人在保加利亚索非亚联名出版文集《转向东方》（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1922）为起点，它体现了部分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特殊心态，该派认为，俄国是一个有机地融合着西方和东方不同元素的特殊国家，正是这种历史、种族和地理意义上的综合性，赋予俄罗斯民族独特的禀赋和特殊的使命。一度对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持敌对态度的欧亚主义者，却突然在新兴的苏维埃国家雏形中隐约感觉到实现他们理想的可能性，因此转而采取某种亲苏立场，米尔斯基和艾弗隆等人后返回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心态的自然结果。欧亚主义者于1928—1929年间在巴黎创办周报《欧亚》（Евразия），米尔斯基与卡尔萨温、马列维奇、苏福钦斯基、艾弗隆等人共同编辑该报。20年代末，欧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米尔斯基和艾弗隆等构成该运动的左翼，他们的亲马克思主义立场日益鲜明，这最终导致该运动在30年代中期的分裂和消亡。

言及米尔斯基与欧亚主义运动的关系，人们常会提起他生活中的两段逸事：一是他与苏福钦斯基的妻子维拉·亚历山大罗夫娜·苏福钦斯卡娅（1906—1987，她出嫁前姓古奇科娃，后嫁给一位英国共产党人，随夫改姓特莱尔〈Traill〉）的罗曼史，这位女士后曾以维拉·米尔斯卡娅（Vera Mirsky）为笔名创作英文小说，或将俄语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一是米尔斯基与艾弗隆的妻子茨维塔耶娃的亲近。茨维塔耶娃曾在《诗人论批评家》（Поэт о критике，1926）

一文中对包括布宁、吉比乌斯在内的“境外批评家”表示不满，她随后却写道：“也有令人欣慰的明显的例外——即不从表面的政治特征出发去评判诗人（那样的文章还少吗？）——斯维亚德鲍克-米尔斯基公爵的文章就是这样的。”^① 1926年3月，米尔斯基邀请女诗人访问英国，他在两周时间内不离茨维塔耶娃左右，茨维塔耶娃在寄自巴黎的信中告诉友人，米尔斯基领她“吃遍了”伦敦的餐馆。后来，或许由于米尔斯基热情消退，或许由于茨维塔耶娃很快移情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②，两人关系趋于冷淡，但我们仍然注意到，米尔斯基1926—1928年间参与创办的欧亚主义杂志《里程碑》（Версты），其名称便取自茨维塔耶娃1922年出版的同名诗集。

20世纪20年代末，米尔斯基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同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28年，他前往意大利索伦托拜访高尔基，与高尔基的长谈更促进了米尔斯基世界观的转变。他在回来后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感觉我不是置身索伦托，而是置身俄国，这次置身俄国奇怪地使我顺服了。”^③ 1931年，米尔斯基加入英国共产党。之后，米尔斯基的思想迅速左倾，1931年6月30，他在英文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上发表《我为何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Why I Became a Marxist）一文，公开亮明其政治身份，可他在归纳这一转变的原因时，却出人意料将苏维埃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对他产生的震撼作用列于首位^④。此后，他直接求助高尔基，请后者出面帮他获得苏联国籍并安排他返回苏联，他在这一时期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到，他之所以写作《列宁传》一书，就是为了

① 汪剑钊编：《茨维塔耶娃文集·散文随笔》，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董晓译文，译文中的“斯维亚德鲍克”即“斯维亚托波尔克”。

② 见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抒情诗的呼吸（1926年书信）》，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③ 转引自 А. Бирюков, “Князь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с. 7。

④ 见 А. Бирюков, “Князь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с. 13—14。

“不两手空空”返回苏联，他愿意献身于“列宁的事业”^①。1932年9月底，米尔斯基自法国乘船抵达列宁格勒，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最终返回苏联。

回到苏联后，原本希望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大展一番宏图的米尔斯基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另类身份，于是退回文学。“获得苏联国籍，外加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工作能力，以及高尔基的鼎力支持，这些因素使得德·米尔斯基（这是他当时的笔名）迅速成为文学进程中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积极参与者。”^②他研究普希金，评论当代文学，同时译介英语文学，尤其是艾略特、乔伊斯等人的作品。但是即便在文学界，他的阶级出身和海外经历也时常引起猜疑，当他撰文对法捷耶夫的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提出批评时，便引起许多“无产阶级作家”的口诛笔伐，直到高尔基在《真理报》上发文力挺米尔斯基，方替后者解围。1934年，米尔斯基加入苏联作家协会。与其“英国时期”相比，米尔斯基“苏联时期”的文字越来越多“庸俗社会学”色彩，如他参加写作的歌功颂德之作《斯大林运河》（*Канал имени Сталина*，1934）。但是，米尔斯基仍体现出旺盛的写作能力，据史密斯教授统计，米尔斯基1932—1937年间写作并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多达近百种^③，其中较有价值的是他的普希金研究文章以及他译介的英国文学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编纂的《英国新诗选》（*Антология новой английской поэзии*，1937）。这部厚达453页的诗选收入了勃朗宁、哈代、叶芝、劳伦斯、艾略特、欧文、奥登等人的诗作，此书在米尔斯基被捕之后才出版，编者的

① 转引自 А. Бирюков, “Князь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с. 10.

② А. Бирюков, “Князь и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с. 15.

③ G. S. Smith, D. S. Mirsk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Published in the USSR, 1932—1937*, See D. S. Mirsky: *Uncollected Writings on Russian Literature*, Berkeley Slavic Specialties, Berkeley, 1989, pp. 368—385.

姓氏也被虚拟为“古特涅尔”(М. Гутнер),可这部所谓的“古特涅尔选本”(гутнеровская антология)却流传甚广,至今仍为人所知所读。

在米尔斯基的“庇护人”高尔基于1936年去世后,在苏联肃反运动愈演愈烈的情势下,米尔斯基终于在劫难逃。1937年7月2—3日深夜,米尔斯基被秘密警察逮捕,后以间谍罪被判处八年劳改,被流放至苏联远东地区,1939年6月6日,米尔斯基死于马加丹市(Магадан)附近的“残疾人劳教所”(ОЛП “Инвалидный”)。他于次日被草草掩埋,据劳教所档案记载,他被埋在劳教所以东800米处,墓穴深1.5米,“脑袋朝西”^①。

米尔斯基的一生被截然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沙皇时期、英国时期和苏联时期,他似乎善于顺风行船,如一位英国记者所调侃的那样,“米尔斯基居然能成为三种制度的食客,即沙皇制度下的公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授,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文人”^②。然而,米尔斯基的一生仿佛又构成一个巨大的悖论:世袭的贵族和激进的自由派,文人和武士,白卫军官和共产党员,反苏流亡者和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他往往会先后、甚至同时扮演这些截然不同的角色,他获得的“红色公爵”(Красный князь; Red Prince)或“公爵同志”(Товарищ князь; Comrade Prince)之绰号,似乎正是这种矛盾组合之概括;他在西欧和俄国、东方与西方、文化和政治、俄国文学和英语世界等不同领域间往来穿梭,形成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三

米尔斯基于1924年动笔写作这部《俄国文学史》,其动机既有

① G. S.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 p. 318.

② Г. Прашкевич, “Еще раз об авторе этой книги”,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по 1925 год*, с. 861.

在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教授俄国文学课程^①以及履行与克诺普夫出版社 (Knopf)^②所签合同的实际需要,也有向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欧推介俄国文学的强烈冲动。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并非英语世界中关于俄国文学的最早史著,在它之前早已有过多部同类著作,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后所附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便是一个证明。米尔斯基写作这部文学史的“条件”似也并不理想,他身在异国,所能利用的研究资料和文学作品相对有限,他在下卷序言中就曾抱怨,他“最大的困难是难以读到1914—1918年间出版的图书”,因为“苏联当局禁止出口革命前出版的图书,这也造成巨大不便”,他甚至无法参阅《布罗克豪斯-艾弗隆新版百科全书》和温格罗夫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等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他承认他的写作遭受的“最大的影响即传记资料不足”。再者,米尔斯基是在用英语表述他对俄国文学的解读,他的英语水平再高,也不得不另外一套话语来阐释他的感受和思想,至少要将大量的概念、标题和引文译成英语。但就在这种种不利条件下,他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便写出这厚厚两大部的文学史著。

史密斯教授对这部史著推崇备至,在评价它时毫不吝惜最高级修饰语,称其为米尔斯基的“终身成就”(a lifetime's achievement)^③,米尔斯基的创作“巅峰”(the peak)^④和“最高荣光”(the crowning glory)^⑤。史密斯写道:“这两本书自面世后便成为标准之

① 此书上、下卷英文版扉页上均如此表明其作者身份:“伦敦国王学院俄国文学讲师”(Lecturer in Russian Literatur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② 该出版社由克诺普夫 (Alfred Abraham Knopf, 1892—1984) 1915年创建于纽约,以出版高水准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著称,社标是一只奔跑的俄国狼狗,该社于1960年并入兰登书屋,现为贝塔斯曼传媒集团名下的克诺普夫-道布尔戴出版社集团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③ G. S.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 p. 109.

④ G. S. Smith, *D. S. Mirsky, A Russian-English Life, 1890—1939*, p. 79.

⑤ G. S. Smith, “D. S. Mirsky, Literary Critic and Historian”, in *D. S. Mirsky: Uncollected Writings on Russian Literature*, p. 35.

作，它们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研究俄国文学的英语学者。”^①他还引用了英国诗人和学者多纳德·戴维（Donald Davie，1922—1995）关于米尔斯基文学史所说的一段话：

这两部书是文学史写作之样板：它们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首先是结构出色，清晰而又比例得当。尚无一部英国文学史，无论多卷或单本，能如米尔斯基这部俄国文学史一般为英语增光添彩。^②

在戴维看来，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这部由一位俄国人用英语写作的俄国文学史，竟然能“为英语增光添彩”！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之所以能在英美斯拉夫学界“称雄”数十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客观因素使然，更是作者自身的天赋和素养之结果。

米尔斯基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完成的。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西欧列强出于地缘政治、外交等方面考虑，开始对俄国和俄国问题表现出空前关注。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后起的大国，其历史和文化对于许多西欧国家而言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未知地域。以英国为例，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还是政治经济方面，它与德、法等国的关系都远远超出它与俄国的关系。于是，对于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俄国之一切的认识和理解，便成了当时西欧列强所面临的迫切的现实任务。

① G. S. Smith, “D. S. Mirsky, Literary Critic and Historian”, in *D. S. Mirsky: Uncollected Writings on Russian Literature*, p. 35.

② D. Davie, “Introduction”,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Modern English Fictio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Chicago-London, 1965, pp. 11—12. 转引自 G. S. Smith, “D. S. Mirsky, Literary Critic and Historian”, in *D. S. Mirsky: Uncollected Writings on Russian Literature*, p. 35. 出版此书时的戴维刚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任教，转而前往美国任埃塞克斯大学副校长。

其次，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的大量俄国侨民，尤其是其中为数甚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俄国境外构成一个茨维塔耶娃所谓的“喀尔巴阡的罗斯”，即一个俄国境外的俄國小社会，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欧人对俄国的兴趣和关注，而这个以文化精英为主体的“小社会”所体现出的旺盛的文学和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更让西欧人感到惊讶甚或震撼。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米尔斯基向西欧读者介绍俄国文学时，当时的整个欧洲已开始被 19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所“征服”，欧洲广大文学读者对俄国文学的兴趣迅速增长，他们大量阅读俄国文学作品，谈起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来津津乐道，许多作家学者开始以俄国文学为题写书撰文，如法国外交家兼作家德·沃盖（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的《俄国小说》（*Le roman russe*, 1886）、西班牙女作家艾米莉亚·巴赞（E. Pardo Bazan）的《俄国的革命和小说》（*La Revolución y la novela en Rusia*, 1887）、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勃鲁克纳（A. Brückner）的《俄国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 1908）以及前文言及的巴林和佩尔斯等人的相关著作，均对西欧的“俄国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新近有俄国学者“精确”地将俄国文学在西欧的“崛起”确定在 1881 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一年（顺便提一句，这与米尔斯基文学史上、下两卷的分期完全一致），并进而指出，俄国文学的崛起在促进西方俄国观之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总之，在米尔斯基动笔写作《俄国文学史》时，整个西欧正处于欲了解俄国却又云里雾里、欲阅读俄国文学却又不甚了了的关键时期，米尔斯基的这部文学史实可谓生逢其时。

然而，米尔斯基这部文学史的脱颖而出，首先自然仰仗其作者自身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和因素。米尔斯基出身世袭大贵族，像那一

^① 见巴格诺：《西方的俄国观》，刘文飞译，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144—161 页。

阶级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对他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俄国及其历史为骄傲；与此同时，他又自视为新近崛起的伟大的俄国文学之代表，因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同胞而感到无比自豪。因此，他虽为一位背井离乡的流亡者，伦敦一所大学里的“讲师”，可他却如赫尔岑等人一样，在面对所谓“市民化的”西欧时毫无自卑，却反而持有某种文化和精神上的优越感。米尔斯基在西欧学界游刃有余，当然还得益于他杰出的语言天赋和关于西欧文学文化的渊博知识。米尔斯基精通德、法、英等主要欧洲国家的语言，其英语水平更是非同寻常，他在此书序言中致谢哈里森时曾言及他“糟糕的英语”，这实为过谦之词，用史密斯教授的话来说，就对英语的精通而言，米尔斯基“在俄国作家中除纳博科夫外再无敌手”^①。无论是在文字里还是演讲中，他谈起西欧诸国的文学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而相形之下，他的西欧同行们对俄国文学的了解却显得相当粗浅，这么一来，米尔斯基的自信和优越便不言而喻了。总之，俄国人固有的“弥赛亚”意识，俄国知识精英的文学优越感，以及由于深谙西欧语言和文化而获得的自信，这三者相互结合，便赋予《俄国文学史》作者一种指点江山的豪气和舍我其谁的霸气。

在这部文学史中，米尔斯基论及某位作家的风格时常常使用“调性”（intonation）一词。我们若反过来用这一概念归纳米尔斯基的文学史，便可将其特殊“调性”确定为自信和个性化。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言及米尔斯基的文学史时便注意到了这一特征：

米尔斯基的评判十分个性化，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对于那些不知为何令他欣喜或激动的作家，他毫不吝惜华丽的

① Ed. by G. S. Smith, *D. S. Mirsky: Uncollected Writings on Russian Literature*, p. 20.